



14所高校为普通中国人的诚信做一次实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2019年6月，世界权威学术期刊之一《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论文，论文中提到，研究人员于2013年-2016年间在全球40个国家355座大型城市开展了一场“丢钱包”的实验。

实验中，10余名外国助理员假扮成捡到钱包的路人，把钱包交到当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手中，请他们处理一下钱包，随后离开。钱包里留下了“失主”的人名和电子邮件，没有留电话。

此后100天，研究人员统计了这些城市的电子邮件回复率，并以此作为公民诚信度的指标，对40个国家进行诚信度排名。结果显示，中国排名最末。

此结论一出，迅速引发广泛争议。不少中国读者在论文下方留言，称“作者没有考虑不同国家人们的电子邮件普及率”“中国人通常使用电话和微信”。

面对这些质疑，论文作者回复称，选择电子邮件作为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出于实际考虑，“因为许多国家、电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公司都需要居住或身份证明才能办手机号”。并称文章主要研究“钱包里金额大小对钱包报告率的影响”，比较各国的诚信度不是论文的重点。

但这并不能说服中国的读者。为了驳斥对方的结论，中国14所高校的老师按照原实验流程，在国内进行了一场扩展性的复制实验，重新衡量国人的诚信度。

今年7月，这场实验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另一国际重要刊物《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研究显示，虽然在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是27.4%，但“钱包回收率”却达到77.8%。

一场没有回报的研究

看到原文“中国公民诚信度垫底”的结论时，很多中国学者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很震惊”，浙江大学教授杨萃说。她多年来研究社会文化心理学，觉得中国文化向来视诚信为美德，且国人已经全面脱胎，不会为了原实验中钱包里放的几十元人民币违背诚信。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张明吉认为，原研究20%多的诚信度不符合常识。因为在原实验中，外国助理员“丢钱包”的地点是在城市市中心的公共场所，比如银行、剧院、博物馆、警察局、法院、酒店等。“它是一个公共服务区，说不是别人会看到，摄像头拍得到。(收到钱包的)工作人员不可能那作他用”。

而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亚程看来，原研究对公民诚信的衡量标准存在问题。“原研究假设唯一道德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联系失主。我们不同意。”他认为，保存钱包等“失主”来取也是诚实的表现。

孙亚程和有同样疑问的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在3所高校做了又一次小范围的实验。他们让学生在校园人流密集的区域投放了400多个钱包，钱包里留有人名和电子邮件，结果发现24%的人联系了“失主”或者上交钱包，而71%的人选择保存钱包，等待“失主”认领。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和实验结果写成邮件，以稿件的格式投给了《科学》杂志，但编辑部只是将邮件内容

实习生 牛益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上学时坐在最后一排，从不举手回答问题；上班时把头埋在工位，几乎不参与闲聊；耳朵里总是塞着耳机，口罩时常常遮住半张脸，即便是每天朝夕相处，也很难描述出他的性格和特质。

24岁的李怡就是这样一个“影子人”。在他人评价中，她是一个“极度内向”的女孩，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并不是内向，而是她无时无刻不对社交感到恐惧。

从小到大，因为害怕别人的目光，她习惯性躲开人群；每次说话前再三打好腹稿，却会在插话时机上不断纠结；无法控制根本自己，几乎每个深夜都觉得自己差劲，根本不值得被爱……发展到后来，每次说话时她都会伴有躯体反应，下意识地手抖、出冷汗，甚至发不出声音。

李怡患上了社交焦虑障碍，这是一种多发于青少年的焦虑性神经症，又称社交恐惧症。2019年中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社交恐惧症的年患病率为0.4%，终身患病率为0.6%。以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计算，每年被诊断为社交恐惧症的患者有560万人。

相较于大多数人调侃式的自称“社恐”，生理层面的社交焦虑障碍时常被忽视、很难被诊断、更难被克服。

症结

“社恐”的难，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学季是彭宇最讨厌的时刻。安静了一整个夏天的校园忽然变得熙熙攘攘，走在路上的总能碰到同学。他想去暑假，安静上宿舍、空无一人的实验室、不用人挤人的食堂，他可以不用耗费任何心力跟人交谈。



此次研究的作者团队

受访者供图

发在了评论区。

“要用学术方式去做一个正经的反驳”，孙亚程意识到，想揭示原论文研究上的缺陷，需要用科学严谨的方式搜集更多数据。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欧道明大学华人教授张琪在一个微信群里发起了复制实验的倡议。张琪说，他不相信中国人的诚信度这么低，但不确定从科学的维度衡量是否如自己所想，“要用实验证明自己的猜想”。

他向老师们强调，此次研究没有资金支持，还有可能发不出来，“要心甘情愿来做这个事情”，但老师们还是纷纷响应他的倡议。

杨萃是第一个响应的。她说，复制实验是社会科学实验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近年来，学界一些人认为社会科学实验不可重复，整个学科面临危机，“这是一次重建学科范式的机会”。

紧接着，上海、陕西、广州的老师纷纷响应，老师们一边在线上讨论实验内容，一边在自己的城市招募实验人员。

讨论过程中，张琪鼓励大家争论，“谁有道理听谁的”，这使得每一个实验细节都被充分讨论。一位学生指出，原实验的钱包里放的钥匙太新，容易让人怀疑钱包的真实性，负责采购的老师便专门在网上买了复古钥匙。还有一位老师提到，去法院“丢钱包”不符合实际情况，“法院要被穿过一个很长的庭院，而且戒备森严”，法院便被从实验地点去除。

“尽量复制一个真实世界。”张琪说，除了严格复制原实验的流程，老师们更重要的任务是设计新的实验环节，弥补原文只靠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诚信标准的缺陷。

为此，他们增加了“钱包回收率”的指标，并补充了回访环节——让实验人员假装成失主的朋友，在实验结束7天后找机构的工作人员要回钱包，如果钱包能找回，则意味着机构的工作人员妥善保管了钱包。

此外，他们还补充了中国“卧底”观察员的角色。张琪说，考虑到现场环境可能影响“电子邮件回复率”，在原实验中，外国观察员交钱包时，还要观察现场的环境，记录“是否有其他人在场”“建筑物内是否存在摄像头”等因素。但这些外国观察员不熟悉中国，不一定能够

区分保安、雇员或顾客，无法准确统计在场人数，也可能在与接受者沟通的压力下，没有时间去记录现场环境。

“这相当于实验中的一个黑箱”。于是，有老师建议，让中国观察员记录环境，并让他们观察多少员工参与处理钱包，为之后的诚实行为分析提供更多参考。

但有的老师质疑这一提议，认为每增加一个人，就会增加被识破的风险。

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老师们最终决定，将每个城市的机构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的观察员不介入实验过程，只是在国外研究助理介入之前“扫描”现场环境。第二组的观察员则介入实验过程，在国外观察员交钱包时暗中记录环境、观察钱包处理的过程。

后来的数据证明，在隐匿好的情况下，观察员的介入并没有影响分析结论。不过，出于严谨，“要把一切可能影响的因素都考虑到”，杨萃说。

一次次总结失败的教训

为了保证实验顺利进行，他们先在杭州进行了预实验。

“预实验就是一次一次总结失败的教训，制定出更加标准的实验流程。”张琪说，很多实验细节都是通过预实验丰富起来的。他记得，最初设计实验时，只设置了1名中国观察员在现场观察记录。但预实验时，学生很难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便增加了用微型摄像头拍摄。

后来，学生反馈，1个人记录、拍摄，忙不过来。观察员又增加到两个人，分别负责记录和拍摄。

预实验之前，踩点组的同学要先去现场确认实验地点，外国助理员和两名中国观察员则需要先在办公室、超市练习实验过程。一位当时负责拍摄的学生说，实验时，她要学习如何自然地拿起奶茶杯，用杯里硬币大小的微型摄像头记录现场。“举的角度、摆放的位置都需要调整，要控制摄像头的方向，不能抖得特别厉害。”

实验前，3名观察员还要提前商议进入现场时的顺序、站位、拍摄的最佳角度，“像兵棋推演一样”。张琪说，刚开始实验时，有的小组成员没有沟通就去现场，导致站的位置不对，什么都没拍下来，他们



参与实验的部分学生成员

受访者供图

才发现提前商议的重要性。

吴礼桦是回访组的一员。她记得在杭州预实验参加回访时，有两个实验点没有名片里的人名信息，她说不出“失主”的名字，导致回访失败，她在当天的实验总结中强调，踩点时一定要准确记录名片信息。

杭州的预实验结束后，老师们根据实验流程，带领学生在各自的城市再次进行预实验，之后才开始正式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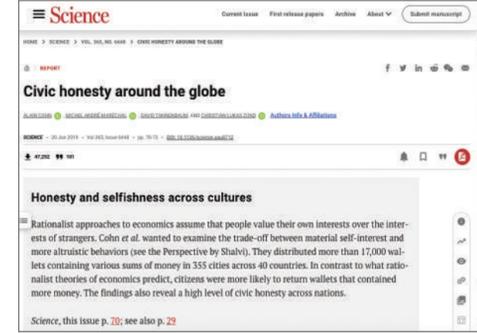
实验的过程很辛苦。一名在北京参与实验的学生记得，实验那几天，她每天在外面待10个小时，顶着烈日走两万多步，回到宿舍后还要上传数据，和老师复盘当天的问题。她听说成都参加实验的同学穿着凉鞋，脚被磨出了水泡。

2019年年底，除了4个实验点因为场所关闭等原因没有完成实验，全国496个点的数据全部收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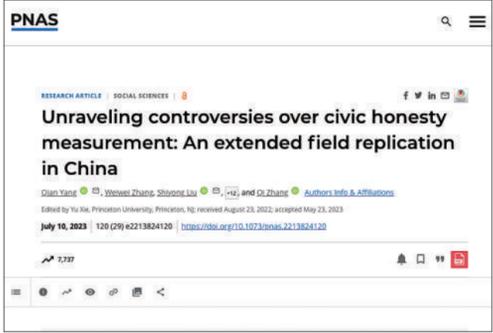
张薇薇负责此次数据分析工作，也是署名作者里唯一的学生。接到导师的电话时，她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读博一。张薇薇说，她参加实验的初衷很简单，想看看复制实验的结果，跟老师们“学点东西”。

但她没想到，光是数据分析就花了1年半。

新的实验数据显示，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原论文的数据相差无几，但“钱包回收率”达77.8%，“中国的公民诚实水平明显高于最初研究报告的水平”。



2019年6月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截图



今年7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研究截图

社交恐惧：一座不被理解的情绪“围城”

对患者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在他们眼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对话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审视的眼光犹如一座大山。他们不仅紧张，还会头晕、燥热、发冷、心跳过速、胸痛、呼吸急促、头痛。

搁浅

和人际交往的技能需要练习，袁梦发觉自己“不进则退”。

她喜欢给自己打造“搞笑女”人设，就像“角色扮演”。一旦需要和人际交往，她就会把不想讲话、害怕社交的自己封存在心底角落，伪装成一个会社交的人。伪装几乎是每个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必备技能。今年24岁的李怡则习惯了每天早上醒来，在床上预设一遍今天可能产生的对话——

“昨晚睡得怎么样”“早餐想吃什么”“今天打算做什么”，在完全做好心理准备后，才会从自己的小床上下来，推开门，开始今天的生活。

这并不是少数。豆瓣“社恐抱团取暖”小组中，一位网友描述着自己假装外向开朗的日子，在反复练习后才终于习得了外向技能。但问题在于，尽管在工作中有用，但外向始终不是自己天生的那层表皮，表演外向时始终觉得自己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在里面待一时可以，待久了会窒息。”

彭宇把这形象地比作“电量”。社交需要消耗电量，一旦消耗殆尽，就必须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对他而言是宿舍的小

床，拉上床帘，戴上耳机，慢慢恢复自己的平静。

几乎每一位“社恐”人士都希望自己能“走出来”，但困难重重。

刘显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因社交恐惧被搁浅了。“我知道，我不能再继续在家里待着了，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走出去。”每次站在家门口，刘显然总是升起“要不要工作”的念头，坐在门口想一整天后，再默默回到自己的小窝里。

因为社交恐惧，她已经在等待了两年。多数时间里，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乎断绝外界一切对话，非必要不会出门。即使出门，她也会用口罩、帽子耳机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恐惧步步逼近，自己节节退败。在大学期间，由于恐惧水和游泳馆里的人，刘显然无法按时去学游泳，不得已延毕半年。同学都顺利毕业，刘显然不自觉地会陷入一种自我责备，为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洒脱地社交而感到羞愧。

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心理活动可以被认知加工偏差，比如在面对社交人群时会夸大负面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对模棱两可的情况作出消极的解释。

对她而言，社交是“如履薄冰”的。“一旦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完美，我就会无限制地去反思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大，所有尴尬的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在她的脑海里重映。接下来，她会不自觉陷入一种绞尽脑汁回想细节的状态，最终认定“今天的社交太失败了，对方一定不想下次和我一起出去玩”。

她害怕任何带有自身观点的举动，比

的典型特征。

对钱包处理情况的观察和回访也为这一分析提供了证据。“卧底”观察员的观测记录显示，31.6%的机构中，参与钱包处理的人数是1人，而回访阶段的访谈报告显示，1人处理钱包的情况只有19.0%，这说明更多人处理钱包时，是集体决策。

经过数据分析，老师们还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集体主义指数呈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这为评估公民诚实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今年7月，在经历半年的理论补充后，论文终于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像长跑拿了个冠军”，张琪回忆论文发表时的心情。

紧接着，《科学》杂志报道了论文发表的消息，杂志编辑Ekeoma Uzogara肯定了论文的价值，称《全球公民诚信度》一文“仅仅依赖电子邮件回复率可能会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诚实度给出有偏差的估计”。

原文的3名作者也给杂志社发来回信，肯定了中国团队的主要研究结论，同时，他们对论文提出了几点疑问，孙亚程告诉记者，关于这些疑问的回复文章将于近期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基于事实的对话胜于基于情绪的对抗。”孙亚程说，最初看到《科学》的论文时，他感觉到被冒犯，写的回复信也“带点情绪”，但情绪不能赢来尊重和对话。

张琪觉得，这次研究的成功离不开求真务实、循序渐进，“如果不循序渐进，就会错失掉很多重要的细节，造成整个实验的崩塌。”另一个重要的点是自由、平等，“要允许争论，把争论看作一个正常的科学过程”。

张薇薇记得，讨论过程中，老师们经常吵架，最长时吵两个小时，“我当时挺惊讶的”。老师们还会听取她的意见，并将她列为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公平的团队”。

张明吉说，日常科研中，团队人员大多是师生、同事关系，碍于上下级身份或者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一团和气”，但这次研究因为是自愿合作，反而可以随时争论。“应该多一些科研人员灵活自主，多一些凭兴趣出发的创新。”

“得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把它做完。”张琪回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师们都很累，“压力非常大”。有一段时间，老师们几乎全都病倒了，有的老师经历家里人生病、去世，还在熬夜分析数据。

“不能中途‘撂挑子’，这也是个诚信问题。”刘世勇说。

杨萃觉得，“得有个交代”。张琪把这次科研看作一次难得的研究机会，“你一辈子有多少机会能够为全部中国人做研究？”

有老师记得，在成都做实验时，一位同学不慎将摄像器材落到地铁上，一位乘客捡到后，交给了地铁工作人员，摄像器材得以找回。“这是中国人诚信的另一佐证。”

型人格”等多元人格类型相互交织。在“社恐”青年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在追问着诸如“交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应该如何交往中自处”等关键问题。

一方面，以父母和独生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占据主流，年轻人缺少同辈，本身就社交经验较少；另一方面，网络的畅通发达也让青年更容易塑造自己的“媒介形象”，更依赖网络社交。多数“社恐”青年都是重度网络使用者，他们的社交半径在网络的延伸下，变得广阔又狭窄。

袁梦发现，社交给自己带来的最大压力是“外界评价”。每当和别人聊天多说了几句，她总是不自觉陷入对别人的评判，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思考他人的反馈，无法接受别人口中对自己的“不良判断”。

彭宇则认为，自己的焦虑源自自卑。从小不喜欢说话，他时常被亲戚认为是“木讷的怪人”。在学校经历过孤立和校园欺凌，他的思考方式变得消极悲观，不敢在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没有人在听”。

两年里，刘显然无数次听到亲戚希望她改变的声音，“在家待着人会废掉”的劝解并不能解开她的心结，反而让她更害怕和人际交往。

“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不会融入社会了。”刘显然说。她希望能给人生一段喘息，短暂逃避社交带来的内耗和自我拉扯。

袁梦希望，社会能多给像自己这样的“社恐”一点时间，不要总是用价值标准来判断人生成败。“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

每一次焦虑，意味着迷失一次自我。但现在，李怡觉得自己在接受这种失控，“空白是暂时的”，她相信属于自己的驿站终会出现。

（应受访者要求，李怡、彭宇、袁梦、刘显然均为化名）